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rxism and Formalism

杨建刚 著 ■



人民出版社

文艺美学研究丛书（第三辑）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rxism and Formalism

杨建刚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宫 共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杨建刚 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ISBN 978-7-01-018418-0

I. ①马… II. ①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②形式主义-历史-研究 IV. ①A81②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7990 号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

MAKESIZHUYI YU XINGSHIZHUYI GUANXISHI

杨建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3.75 字数:553 千字

ISBN 978-7-01-018418-0 定价:7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一

好久没有读到如此畅快淋漓、动人心弦的长篇大论了。尽管多年前我已经看到了它的雏形,尽管多年来我已经不再关注这一话题,尽管多年来我对师生之间相互“站台”而不屑,更枉谈“举贤不避亲”……等等“尽管”,我还是不吝誉美之辞为这一小序开篇。

建刚 2006—2010 年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我最喜欢、最在意的学生之一。我喜欢他从三秦大地带来的泥土芬芳,喜欢他对学业、学术的执着和专一,喜欢他行事爽快、处事干练的品格,在意他选择这一高难度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在意他由此起步能否衍生出自己的新路,在意他面对种种诱惑如何保持自省、能否有足够的定力我行我素……

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是一个“高难度问题”,在于以往对它的理解一般定格在二者的“对抗关系”,无论是学术史描述还是理论话语本身,该论题似乎都在表征如此不言自明之理,就像“内容与形式”“道与器”那样明确两分。建刚所挑战的就是这一早已存在着的、几近成了共识的学术成见。他的方法是“用事实说话”,避免了“空对空”泛论,即撷取学术史上最有代表性、最典型的个案,在总体性把握的同时侧重深度学理辨析,揭示二者既对抗又对话,对抗中有对话、对话中有对抗的复杂关系。就此而言,我非常赞同乔纳森·卡勒的那句话:“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这是因为,由此反观我们的许多所谓“理论”,其实并非如此,诸如“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之流,实则是常识的重复和宣讲。于是,我在建刚对既往成说和“常识”的挑战中,似乎看到了卡勒所说的真正“理论”,以及“文学理论”在新一代青年学人那里的重塑和希望。

“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的旅程一路走来,“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研究已为建刚赢得了许多肯定和赞誉,此乃实至名归。与此同时,也有一种不甚赞同甚或完全相反的声音,据说这种声音还是来自“老牌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自封、自诩的。在这位自封、自诩的“老牌”和“权威”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就是形式主义,二者风马牛不相及,

怎么能把本来对峙的东西扯在一起呢？讨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疑问足以证明这位“老牌”实乃“不读书不看报”者，属于不接受任何新事物的“权威”。新中国文艺理论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和活的灵魂，恰恰是在这些自诩的“老牌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丧失了生命力。我当年之所以坚定支持建刚的这一选题，并非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许多偶然因素使然。这需要回溯十年前我和他的多次交流和讨论。

我支持建刚的这一选题，首先基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而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又缘自当时我的学术兴趣已经发生了转移，即从马克思主义入门文艺理论、后来转向形式美学的经历，其间积累了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经验，同时也有长期存疑的问题挥之不去，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关系。其中一个偶然的因素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收到一本寄自美国的英文书——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尽管我不能读懂其中大部分内容，但是，仅就书名就足以让我眼前一亮，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话题。于是，我立马跟中国艺术研究院程代熙先生联系，建议他组织翻译和推荐出版，后因各种困难未果。于是，在和建刚讨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时，往日的心结被再次勾起，推荐他读一读这本书，尝试是否可能再次面对这一挑战。我想，他最终确定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首先是受到詹姆逊教授的启发，由此萌发了重新挑战这一难题的冲动。他在此基础上扩写与完善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也就成了第一部由我国学者涉足这一重要问题的专著；与詹姆逊的那部论著相比，建刚所秉持的中国立场和中国问题显而易见，其开拓性和前沿性不言而喻。

当然，我在意建刚的这一研究还不仅在论题本身，更在于这一论题背后的现实意义，即对于“非此即彼”、非“内容”即“形式”之类的二元对立，同样是一种警示和挑战。此类“二元对立”长期控制我们的思维模式，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另外的方法论参照；而脱胎于这一模式的“理论”大多贻害无穷，因为它类似“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使鲜活的文学失去了血肉之躯，理论的对象已经不是在场的文学，理论的自说自话已成为公认且可悲的事实。既然如此，文学也就无须倾听理论的喧嚣，“理论”和“文学”的分道扬镳也就在所难免，前者的意义仅限于“职场填表”和“圈内打赏”。当然，建刚的研究并不是直接讨论这一问题，只是以“用事实说话”的方式，演示了历史上对于二元对立的超越，表征了这一超越的可能性及其愿景。如

是,中国文学理论之大幸矣!

建刚在向我索序的信中表示,自己希望尽快结束这一专题。他产生这一想法并非全出于“厌战”,而是想要开辟新的问题域。我理解他的意思,我也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在此不妨唠叨几句,无论建言或帮腔:

一个学者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难免会面临多次阶段性选择,而怎样选择和选择怎样的问题却大有讲究。参照我的经验,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莫过于处理好“顺手”和“应该”的关系:所谓“顺手”,就是更多地参照既往学术积累,延续自己比较熟悉的论域;所谓“应该”,就是更多地考虑学术价值,选择自己虽不熟悉却更有意义的问题。毫无疑问,大凡有责任心、有远大抱负的学者,肯定会选择后者,即便已经预测到后者会遭遇多少困难、面临多大风险。当然,克服这些困难、直面这些风险,需要有超越自己的勇气;而只有勇于超越自己,才能超越昨天、超越“常识”而进入真“理论”。这就是我一直倡导的“登高山”而非“走平路”的治学路径,“著作等身”“以量取胜”不是最佳选择。我想,这也应该是所有青年学人成长的正途,尽管这路途非常艰辛,而又非常、非常不合时宜。

谨此结束这篇小序。姑妄言之,权且听之。

赵宪章

2017年酷暑于南京草场门寓所

序 二

杨建刚博士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即将付梓出版,嘱我写一个序言。有关本书的评价已经有国家社科项目鉴定为优秀的结论,以及本书有关章节已经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刊发,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充分说明本书的水平和质量。我想着重围绕本书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研究的有关问题谈几点感想。

其一,本课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关系到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的走向。为什么要讲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研究这个课题有将马克思主义引向形式主义的危险。我想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战斗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与任何学术传统的关系研究都无法动摇它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而且,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关系实际上早就发生于现实之中,关系到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的走向。我本人有限的学术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进入高校学习文学开始就面对着文学与政治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之争,也就是所谓向内与向外之争。直到今天,所谓外转与内转、文学的政治研究与文学的美学研究仍然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记得1959年我刚入校不久文艺界就批判巴人的人性论,当时认为巴人最主要的错误就是将人性问题形式化抽象化,割裂了人性的阶级性内容。我帮助高年级的师哥师姐们整理批判资料,真的给我上了入校后的生动一课,从此知道,形式主义是一个不能触动的敏感问题。以后的历史发展建刚在书中已经有所叙述,大家也都明白,直到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与文学以及形式与内容仍然是最敏感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参加了激动人心的庐山会议,会议的议题就是讨论政治与文学以及内容与形式等学术问题。此次会议成为几派政治观点交锋的战场,其激烈程度不是亲历者都难以想象。上海的《文艺理论研究》杂志发表了部分会议论文,徐中玉先生选择的其中十余篇也是观点纷呈,各不相让。此后,文学界讨论的中心就是大家熟

悉的内转与外转、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研究等问题。这些讨论没有一次离开过文学与政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这充分说明内容与形式问题是文学界,尤其是文学理论界最重要的基本问题。对于这么重要的文学基本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作为学术问题加以研究呢?杨建刚博士在本书中详尽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这两个流派在整个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历程及其关系史,这也更加说明这个论题是一个最基本的论题。

其二,本课题是几代学者接力研究的重要成果。有关文学形式问题的研究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开始,许多老一代学者都有研究成果,其中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包忠文先生及其弟子赵宪章先生等就已经在文学形式研究方面努力开拓,成果累累。赵宪章的论著《西方形式美学》我最早还是听到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的推荐。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章先生向我推荐赵宪章的这本书,他认为写得不错。大家都知道,章培恒先生是古代文学领域非常重视理论并较好运用理论的著名学者,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就成功地运用了人性的观点分析古代小说与戏剧人物。章先生的推荐是经过他自己的研究的,非常有眼光。赵宪章的学生汪正龙,还有本书的作者杨建刚,继承前辈学者,继续文学形式问题的研究。因此,可以说,杨建刚的研究是几代学人在本领域持续努力的成果。

其三,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将论题放到历史的视野中加以研究,使之具有科学性与可信性。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英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等形式论学派都是历史的形态,其产生都有历史的原因,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都是在历史中展开的。建刚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史论结合、论从史出、避免空谈。因此,本书的论述具有历史的说服力,研究的历史感也使本书具有其自身的科学价值。

由于本书涉及的论题过于广泛,不可能都论述得详尽周密,加之论题自身的繁难,因此不足之处难以避免。建刚正值壮年,学术的生命还很长很长,每一本书的出版与每一个课题的完成都是学术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希望建刚走得更远更好。

曾繁仁

2017年仲夏于济南六里山下

目 录

序 一	赵宪章 1
序 二	曾繁仁 1
导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历史与方法	7
第一节 形式主义	7
一、形式主义的发展脉络	7
二、本体论与内部研究	13
三、文学与语言学	17
四、形式分析与审美价值	2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	23
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	23
二、总体性与外部研究	26
三、文学与意识形态	29
四、社会学批评与政治价值	32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抗及其消解	3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抗与论争	37
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矛盾的产生	37
二、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否定和批判	40
三、形式主义者的自我省思与忏悔	44
第二节 从对抗到对话的内在逻辑	51
一、政治层面：“资产阶级美学”与“无产阶级美学”的 冲突与消解	52

二、思想层面：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矛盾与融合	56
三、文化层面：知识生产的分化与去分化	60
第三章 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对话	66
第一节 巴赫金：形式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	68
第二节 形式批评与社会学方法的结合	76
一、方法论批判	80
二、超越“文学性”	84
三、“形式—内容”的辩证法	89
第三节 语言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对接	95
一、批判两种语言学	96
二、话语的对话性质	99
三、话语的意识形态特征	102
第四节 小说形式与社会历史文化的互动	105
一、史诗与小说	105
二、小说语言的杂语性	108
三、小说形式与社会历史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渗透	110
第四章 形式的革命与革命的形式	119
第一节 艺术自律：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	122
一、形式主义与艺术自律	122
二、自律与他律的辩证法	124
第二节 艺术本质：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变奏	128
一、黑格尔模式的现代反思	130
二、艺术形式的革命潜能	132
第三节 艺术功能：感性能力的恢复与生成	139
一、陌生化与文学性	140
二、陌生化与革命	147
三、陌生化理论研究的深化与走向	154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融合	161
第一节 发生学与结构主义的接合	165
一、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发展历程与理论渊源	167
二、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与核心观点	174
三、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批评实践	181
第二节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建立	190
一、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	192
二、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196
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	201
四、阿尔都塞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转向	208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形式主义价值重估	215
一、清理地基：形式主义的“文本形而上学”批判	218
二、历史诗学：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超越	220
三、重构美学：阿尔都塞学派与形式主义的对话	222
第四节 “伪马克思主义”与“伪结构主义”批判	225
一、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	226
二、对结构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229
三、阿尔都塞的“伪结构主义”批判	234
四、阿尔都塞的“伪马克思主义”批判	241
第六章 介入、文本与意识形态	246
第一节 介入文学与零度写作	247
一、巴特与萨特	249
二、什么是写作	251
三、作者和读者	256
第二节 结构主义与文本理论	259
一、从作品到文本	260
二、文本与主体性	264
第三节 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	270
一、文本与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	273
二、文本的意识形态生产模式	278

第四节 文本与意识形态阐释	286
一、“辩证思维”与“元批评”	287
二、形式的意识形态	295
三、文本的意识形态阐释模式	303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相互征用与对话	313
第一节 符号学的面相	315
第二节 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范式	324
一、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方法	324
二、罗兰·巴特对作为神话的大众文化符号的意识形态 批判	333
第三节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范式	342
一、霍尔、伯明翰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	342
二、电视文化的符号学批判	349
三、文化表征的路径与方法论批判	351
第四节 批判理论的符号学拓展	359
一、消费社会物体系的符号学批判	360
二、消费社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367
三、后现代文化景观的符号学批判	377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问题	392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转向	393
第二节 20 世纪语言哲学的四大传统	398
一、分析哲学传统	398
二、现象学—解释学传统	401
三、结构主义传统	406
四、马克思主义传统	410
第三节 语言的社会本质	415
一、语言的起源问题	419
二、语言与思维	421
三、语言的阶级性	425

四、民族共同语和方言问题	426
第四节 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428
一、批判理论的语言维度	428
二、批判理论交往转向的演进逻辑	433
三、言语交往行为的运行机制和有效性法则	437
四、交往的话语伦理学及其批判	441
 第九章 对话思维与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建构	446
第一节 未完成的思考	446
一、20 世纪 20—30 年代俄国文论的整体状貌	446
二、马克思主义与布拉格学派的关系	448
三、马克思主义与新批评派的关系	450
四、尤里·洛特曼及塔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学	457
五、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关系	458
六、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与读者反应 批评的形成和发展	460
七、新世纪之交英美文学创作和批评界兴起的 “新形式主义”	463
第二节 对话在中国	465
第三节 对话思维与理论创新	472
 附 录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479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	
 引用文献	488
人名索引	506
主题词索引	516
后 记	524

导 言

在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关系也最复杂的理论流派无疑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二者是两种完全异质的理论思潮,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价值立场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从它们在 20 世纪的发展来看,从苏联到西方,二者之间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到对话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抗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而对话与融通才是二者关系史的主导形态。

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之间的对抗使俄国形式主义最终消亡。过早的终结让俄国形式主义失去了调整和完善自己的机会。同时,缺乏与形式主义的有效对话也使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盛行,并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卢卡奇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又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释。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照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①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教条,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恪守在马克思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辩证方法永远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以“正统”自居,却恰恰是教条地固守马克思的个别论断并将其极端化和庸俗化。相反,巴赫金虽然不被视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辩证思维却是他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摆脱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倾向而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方法,适时调整自己的理论方向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实,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在西方的对话成为可能。事实正是如此。巴赫金虽然生活在苏联的政治语境中,但却在苏联马克思主义

①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48 页。

和俄国形式主义之间持一种中间立场,并把在二者之间进行对话作为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也正是这种有效对话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理论家。同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话也使双方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成为二者进一步发展的理论生长点。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所言:“无需‘寻求’或‘发明’一种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可以说,这种对话已经发生,并且是一种特别富有成效的对话。”^①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深受西方话语的影响。就马克思主义批评来说,20世纪的前70年主要采用的是苏联模式,而后30年则主要是在欧美话语的影响下前进的。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注重“文以载道”与注重艺术形式的审美分析是两个并行不悖的传统,二者之间并没有出现严重对抗的情况,而是在相互补充中协调发展。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面前,“文以载道”模式被推向前台,于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模式被中国知识分子广为接受。苏联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模式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排斥“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批评传统,并最终导致了文学艺术的工具化。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而非批评方法。这种把文学简单等同于政治宣传的工具和“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忽视文学自身的本体特征的倾向,正是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反思“苏联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文学语言和形式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是形式批评的专长。中国古代的形式批评传统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但是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使这一传统并没有得到继承。虽然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瑞恰兹和燕卜苏早在20年代初就已经来中国讲学,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学者也将新批评的文本分析方法用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但是在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面前,形式批评并没有成为批评界的主流。新时期以来,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著作被大量翻译成中文,但是对其研究仍然更多停留在基本理论观念层面,并没有融会贯通,更谈不上

^① Tony Bennett, *Form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9, p.96. 本书作者中文名称有托尼·本尼特、托尼·本内特、托尼·贝内特等多种译法,全书正文中统一采用托尼·本尼特这一通用译法。

在文学批评中的实际应用。^①而且,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于对文学进行内容研究,挖掘文学中的哲理、思想和意识形态,而对文学形式不甚重视,以至于长期以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思想史”代替“文学史”的趋势。^②

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形式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相对割裂的状态。在二者之间进行对话,相互吸收和借鉴,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意识形态)批评与形式主义的形式批评结合起来,可以成为中国文学理论走向繁荣的一条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在西方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相较而言,在中国,二者之间的有效对话虽已开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仍然尚未出现。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从苏联到西方所经历的从对抗到对话的发展过程,探究这一发展的内在原因,并考察他们之间对话的方式和问题,对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对话的可能性,促进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者大都注意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所发生的论争,因此对二者之间的对抗学界已经不再陌生。^③相反,

① 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近几年来这类文章也已经发表了很多。汪正龙在《西方形式美学问题研究》和胡燕春在《“英、美新批评派”研究》中均列专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专题讨论,陈建华和耿海英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30年》、赵毅衡和姜飞的《英美“新批评”在中国“新时期”——历史、研究和影响回顾》,以及支宇的《雷纳·韦勒克对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影响及其话语变异》等文章,都清楚地描述了这一过程,但对其利弊得失还缺乏更深入的探讨。

② 我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思想史”代替“文学史”的趋势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和担忧。温儒敏在《思想史能否取代文学史》(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10月31日)中认为当下盛行的“思想史”方法可能把文学研究引入歧途,从而造成文学研究的自我消解。这篇文章成为这一讨论的开端。紧接着赵宪章发表了《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8日),提出了建立“形式美学方法”的可能性问题。这种方法不是在文学研究中“绕开形式直奔主题”,而是要“通过形式阐发意义”,从而试图解决当前文学研究中“思想史”代替“文学史”的问题。随后,华侨大学召开了以“思想史与文学史”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一直在延续,几年之后,《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还开辟专栏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目前,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仍旧颇受关注,成为文艺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

③ 俄国形式主义研究专家厄尔里希(Victor Erlich)在其著作《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 and Doctrine*) (1955年)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这场论争过程进行了清晰的描述,克里斯道夫·皮克(Christopher Pike)主编的《未来主义、形

虽然二者之间的对话实践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并且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西方学界对这个问题却重视不够,对它的研究寥寥无几。托尼·本尼特是英语世界中第一个注意到这种对话的理论家,他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Formalism and Marxism*, 1979)也是截至目前研究二者之间关系问题的最重要的文献。除托尼·本尼特之外,西方学界对这个问题鲜有论及。虽然托尼·本尼特的这部著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话问题,并且对巴赫金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詹姆逊与形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但是仍然不够全面、深入和透彻。比如,在对巴赫金的研究中,托尼·本尼特侧重于巴赫金的狂欢化问题,而忽视了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中的其他方面。他也没有注意到法兰克福学派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忽视了形式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借鉴和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根本没有论及。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托尼·本尼特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丰富和完善。

虽然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和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早已有了中译本,托尼·本尼特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章节也早在1992年就被翻译发表,^①但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话问题并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直到近几年,这个问题才被中国学者所关注。汪正龙对这个问题关注较早并进行了初步研究。他在《西方形式美学问题研究》一书中列专章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关系问题,^②并发文讨论了二者对话的可能性。^③目前,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文论的关系问题已经受到一定的关注,相关研究日益增多。^④托尼·本尼特的《形式主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The Futurists, the Formalists, and the Marxist Critique*)是西方有关这场论争的比较完备的文献资料。在中国,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批判形式主义的文章,以及苏联学者谢·马申斯基和阿·梅特钦科等论述这场论争的文章也都早已译成中文。

① [英] 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张来民译,《黄淮学刊》1992年第2期;[英] 托尼·本尼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美学遗产》,张来民译,《黄淮学刊》1993年第3期。

② 汪正龙:《西方形式美学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 汪正龙:《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的可能性》,《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

④ 这方面的研究除了笔者的系列文章外,主要还有:段吉方的《重建“对话”思维——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及其意义》(《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和《托尼·本尼特